

非洲框架中的中埃关系

(埃及) 赛义德·阿里·艾哈迈德·弗莱菲勒

【内容提要】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2000 年 8 月举办的中非关系论坛会议上的发言稿。作者从一个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视角对埃及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性:同为影响深远的文明古国、相似的价值观念、遭受殖民主义入侵、民族民主运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立场、发展经济和建设国家;同时在政治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本质差异。作者提出了一些非洲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如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顺差,非洲如何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对非关系同中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等。作者在文章最后就中埃和中非关系提出了七个问题,这些也是中国学者应当做出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 中埃关系 历史相似性 殖民主义 非洲政策

【作者简介】 赛义德·阿里·艾哈迈德·弗莱菲勒(El Sayed Aly Ahmed Fleifel),埃及开罗大学非洲学院院长、教授。电子信箱:flifal@hotmail.com。

序言:方法论的制约因素

以一篇论文总体讨论中非关系,涉及历史根源、当前状况和未来前景,这的确困难。从方法论上说,难以将一个国家同 53 个国家进行比较。尽管中国事实上自己被视为一个大洲,拥有最多的人口和最高的人口密度,但它建立了具有统一政治意志的国家。而非洲则为政治分裂所困扰,尽管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出现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等经济集团。现代非洲国家大多继承了殖民主义的旧边界,从而导致非洲统一政治意志的缺失。

同样,我们可能有机会审视中国的非洲政策,但是我们很难有机会谈论整个非洲的对华政策。这使得谈论双方的关系、各自的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如何看待在非洲和亚洲起作用的其他方面等问题比第一眼看起来要难。

尽管如此,我还是应我的兄弟、朋友和同事——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陆庭恩教授的要

求,在方法论上冒险,总体上谈一谈非洲同中国的关系。自然,我要找一个对应的非洲国家,由于其地理和历史的相似性而以之作为中国在非洲的对应方进行集中论述,这个非洲国家就是我亲爱的祖国埃及。

一、埃及和中国:审视历史相似性

既然前述方法论的制约因素决定了我们选择埃及作为同中国相似的非洲国家,那么我们必须谈到这一选择的原因。在非洲其他国家出现以前,埃及在许多世纪中是唯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它集中体现了政治生活产生的经验,符合高尚社会的规则,受法律和秩序的约束,存在明确分工,文明有重大发展,在尼罗河两岸出现了农业革命,随后是工业革命,以及同二者相伴出现的以书写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这些有助于奠定严密政治体系的基础,而这一体系是独一无二的文明典范。其特征传播到了努比亚(在今苏丹)、阿克苏姆(在今

埃塞俄比亚)、红海南部的彭特(在今索马里),甚至延伸到了南非、津巴布韦文明的遗迹和西非的铁制品,其装饰至今仍保留在非洲妇女的发辫上,其特征仍体现在非洲音乐上,体现在非洲古代文明统一体的感觉上,而其根源是埃及的。

此外,埃及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地区的文明作用使其成为文明进入欧洲和亚洲的门户,而亚洲本身多次对埃及构成威胁,因此,埃及的遗迹在巴勒斯坦和沙姆地区广泛分布。

我们选择非洲的埃及对应亚洲的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中国和埃及具有地理和历史的相似性也不奇怪。亚洲的中国也建立了大河农业文明,并稍晚于埃及建立了集权制国家体制,它是亚洲文明的辐射源,其影响遍及全亚洲。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忽略埃及和中国文明之间的一些本质区别。

埃及文明同中国文明一样是父系文明,而在非洲兴起的文明尽管受到埃及的古老影响,但却是母系文明,因为妇女在埃及以外的非洲一直是生产过程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耶稣诞生前的500年间,中国经历了奴隶制阶段、封建制阶段、诸王朝并立阶段和统一国家阶段。而埃及从文明产生之初就是以自由人为基础的文明,它同全世界都不相同,即便是希腊文明也是分成被视为神的主人、贵族、国王和被视为奴隶的人民。

同样,本质的区别还在于中国有多个民族,其原因在于广阔的领土和跨过中亚高山旷野而来的邻居,这些地区是蒙古和突厥游牧人过往的地方。而埃及是一个有着明确形状和确定疆界的国家,东有红海、西奈山和叙利亚沙漠作屏障,北有地中海,西有利比亚沙漠,南有众多的瀑布和崎岖的岩石,这有助于埃及的人民融合成一个民族,拥有同一个体制、同一个统治者,埃及就像一项经济、政治和社会工程,其核心就是尼罗河和法老统治者,社会授权法老在不同地区及其种植者中公平地分配尼罗河水。而在中国就出现了分离的情况,有时七国并立,有时三国争雄,或者各地争夺中央政权,这在埃及是很少见的。

因此可以说埃及有着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统一,有连续的统治王朝,国家从来没有中断过,前后相继的政府负责着国家的中央工程,即治理尼罗河并公平分配河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老国

家的象征是法老的象征、尼罗河的象征和公正的象征的统一体。这个三位一体象征的含义就是法老拥有尼罗河和人民的主权,他在人民中公平分配河水。

这种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统一为信主独一(Tauhid)信仰在埃及大地上的出现作了准备,便利了对一神信仰的接受。而中国社会经常是一个中央和地方政权对立、精神和肉体对立、光明和黑暗对立的社会,这体现在儒家和佛教的信仰上。尽管如此,埃及和中国社会在一些价值观上有很多相通之处,使得二者得以用最小程度的分裂和最大程度的统一持续生活道路,这包括:敬老、坚持家庭的统一、信仰精神和道德、尊重农业生产关系。

关于农业生产关系,中国人已经参加了数以十记的农民革命,其中有些是反对中央政府的。而埃及的此类革命却是有限的,更像是临时暴动,向统治者发出信号以使其自动改变暴虐的状况。尽管这个统治者在古埃及被视为神,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出现一个“能言善辩的农民”,向法老提建议,斥责他,要求他公正,这种情况在法老时代多次出现。在整个古代时期,埃及是古代世界的中心,中国生产的瓷器和珍玩到达埃及,但是我们认为法老埃及的产品也到了中国,因为古代埃及人进行了环游非洲的哈尔胡夫(Harkhuf)旅行,他们在红海南部和印度洋都有贸易。我们有理由问:难道同中亚的陆路和海路联系不可能吗?

中国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初就闻名于埃及和阿拉伯人之中,先知穆罕默德(为他祈祷,赐他平安)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则圣训一方面尊重中国所拥有的文明,另一方面鼓励到远似中国之地求知。

中国闻名于非洲,非洲也闻名于中国,尤其是非洲东海岸地区的居民,这是由于他们通过海湾地区的阿曼和也门商人同中国从事的贸易活动。到伊斯兰时代开始,中国同非洲的关系具有了同埃及和东非海岸城市进行贸易往来的特征,这些

阿拉伯语 al - Sham 的音译,指叙利亚。
在伊斯兰教教义中,对唯一神安拉的信仰被称为信主独一。

哈尔胡夫(英语作 Harkhaf),古埃及第六王朝法老佩皮二世(Pepi II,公元前 2246 ~ 2152 在位)的一位官员,曾领导在非洲的探险活动。

城市包括基卢瓦、索法拉和摩加迪沙,它们是最重要的商业集结地,远东和近东的贸易多通过它们进行。因此,中国人知道很多非洲的商品,比如象牙、树胶和沉香,象牙在中国有很好的市场。非洲需要的中国商品中最著名的是中国制造的举世闻名、无以匹敌的精美瓷器,还有无与伦比的丝绸。尽管各种材料在有关中国同非洲海岸关系起始年代问题上彼此不同,但是都形容公元 11~15 世纪是中国同非洲联系最频繁的历史时期。

二、对抗欧洲殖民主义的埃及和中国

埃及和中国各自同欧洲殖民主义的关系也有发人深思的区别。埃及从很早起就多次经历了欧洲殖民主义,因为它离欧洲近,是东方离欧洲最近的地方。埃及经历了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十字军、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殖民主义,最近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奇怪的是中国虽然同欧洲相距甚远,但是也没有摆脱欧洲的殖民主义,尽管来得比埃及晚。也许原因在于埃及在整个伊斯兰时代一直是欧洲殖民主义进入东方海洋的屏障。

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亚洲的中国和非洲的埃及两种历史悠久的文明开始遭受其野蛮的入侵。非洲的灾难更甚于中国。欧洲殖民主义强加给非洲 400 年的奴隶贸易,北非、西非和东非的海岸都遭受了灾难。他们强加给中国鸦片贸易以毁灭中国人,而欧洲则变得富有,以最低廉的价格将中国的财富运往欧洲,同时将非洲人运往欧洲和南北美洲,使得白人得以在大西洋另一侧的两个新大洲拓殖。

埃及 - 非洲和中国 - 亚洲经历的相似达到惊人的程度。中国遭遇亚洲强权日本,非洲则在帝国主义浪潮中被瓜分。埃及在艾哈迈德·阿拉比的领导下抵抗殖民主义,而在中国领导抵抗的是孙中山。1882 年阿拉比被镇压之后,埃及多次进行反英起义,包括 1906 年的丹沙维事件和 1919 年萨阿德·扎格鲁勒领导的革命。

对于中国,幸运的是欧洲殖民主义和亚洲殖民主义之间产生了分歧,日本开始同英国和美国在亚洲对抗。而埃及运气不佳,欧洲殖民主义在埃及的东方安插了以色列,开始从亚洲的末端控

制进入非洲的北方入口。

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分歧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人民革命提供了机会,它致力于在苏联的帮助下实现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将中国从欧洲和日本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二是变革不公的社会状况,结束帝国统治。

与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困难处境中,埃及需要面对三种力量:1881~1956 年占领埃及长达 3/4 世纪之久的英国殖民主义;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殖民主义;由美国领导的新殖民主义。埃及在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的领导下进行了 7 月 23 日革命,这是武装部队在人民支持下进行的变革,它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出现的美苏两极来赶走老牌英国殖民主义。纳赛尔拒绝了美国的结盟政策,美国于是利用以色列作为桥头堡阻碍阿拉伯统一。美国还压苏丹同埃及分离,当苏丹坚持其同埃及的天然联系时,美国就挑起苏丹南部问题。

我们在中国革命中同样见到了美国的影子。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利用它来消耗中国,阻止其统一;同时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事端。自然,这些条件把埃及和中国、纳赛尔和周恩来连在一起。尽管中国领导人从意识形态方面看到以色列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发展,从而更倾向于以色列而不是纳赛尔政权,但是他们很快发现纳赛尔革命的真诚,他在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清除殖民主义中的作用,以及他建立埃及独立力量的愿望。

1956 年,埃及遭到英、法、以三国入侵,中国坚决站在埃及一边,有数十万中国青年志愿报名参加对入侵者的战斗。中国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国的权利,它还支持非洲人民从整个非洲大陆清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权利。

另一方面,埃及认为台湾、香港以及外国人在当地的存在类似于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存在。中国领导人一再指出以色列及其殖民主义扩张政策对于阿拉伯人民和非洲人民利益的危险。埃及和中国联合起来为非洲的反殖力量提供帮助,为非洲人民的发展贡献力量。中国修建道路、铺设铁路,埃及则参加到建设高坝的巨大工程中,以之发展了埃及和苏丹北部人民的生活。埃及的大学接待了数万非洲学者,其教育和发展惠

及很多非洲国家。

当中国和苏联发生分歧、双方在边界发生对抗的时候,由于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 1967 年战争,埃及更加需要苏联,尽管埃及并没有彻底失去对中国的同情。

中国在 60 年代进行了核试验,而埃及则致力于清除 1967 年侵略的影响。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在初现端倪的时候,埃及刚刚实现了 1973 年 10 月 6 日的胜利。随着两国领导层的变更,两国都发生了一系列内部的变化,使得两国以传统对苏关系为代价发展了对美关系,两国在这方面为历史的相似性提供了新的范例。

70 年代最突出的特点是埃及和中国在国际政治方面看法的一致。二者对于苏联的立场相似,而且都在相同时间对美国开放,都倾向于通过惩罚苏联的地区盟国来维护自己在本地区的尊严,中国对越南采取了军事行动,埃及则针对利比亚。

埃及和中国的相似性还表现在两国采取经济开放的新经济政策方面。在埃及,这些政策是消费性的,迫使 1981 年继承萨达特的穆巴拉克总统将经济改革导向生产性方向,恢复埃及经济能力的完整计划获得了成功。

中国已经迈出了巨大的经济步伐,以便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政治暴力气氛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包括两个特征:一方面是中央指导和规划的经济,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同时充分注意社会层面。有趣的是,埃及和中国都对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社会公正给予了充分关注,这也许是第三条道路。

两国都从与美国的新型关系和国内经济形势调整中获得了好处,它们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为密切了。中国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埃及通过戴维营的艰苦谈判收回了被占领土。在这两方面中,美国的立场都是积极的,非洲的帮助在支持埃及和中国方面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同样,埃及和中国也受制于美国政策。美国意识到二者作为地区大国的重要性,极力进行联系和协调,同时试图限制和阻止其对美国利益产生消极影响。其手段多种多样,包括技术援助、贸易往来、政治和地区协调,并在这种关系中制造新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反对恐怖主义、主张尊重

人权和民主,它利用这些来限制两国的总体政策以便为美国利益服务。

美国通过以色列和台湾两个地区盟友在中东和远东地区维持平衡。尽管有这种压力,埃及和中国政府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民族目标。埃及坚持拒绝中东市场计划,没有出席 1997 年 11 月的多哈会议,坚持作为巨大民族希望的阿拉伯市场。中国拒绝遏制政策,使用武力反对美国支持的台湾分离主义倾向。

这些条件使得埃及和中国同时思考更为民主的世界秩序,拒绝以全球化为名的隐性霸权,将真正和客观的全球化视为全人类的共同胜利,所有民族和人民都参与其中,而不是西方的垄断,也不是美国的垄断。

三、变化世界中埃及和中国的非洲政策

埃及和中国这种政治上的相似性导致了二者在非洲政策上很大的相似性。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涌向非洲,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从 80 年代以来尤其受到中国的明显关注。如果我们以乌干达为例,中国同乌干达签订了很多经济和技术合作协议,还签订了设立东非建设公司的协定,在道路、住房、医院和体育设施等方面提供巨大支持。中国的这种合作在其他非洲国家也存在。中国产品由于价廉质优在非洲具有重要地位,这导致中国对非洲贸易成倍增长。

尽管非洲国家同其旧的殖民宗主国之间的传统联系仍然存在,中国还是成功地在非洲市场获得了立足点,开始更为关注经济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立场。可以说,中国成功的经济经验是非洲可以借鉴的范例。中国尽管获得了成功,但是它仍然视自己为第三世界国家,它在解决贫困问题、卫生和教育设施缺乏问题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将经济由传统生产模式转变为 21 世纪的经济。因此,中国有资格向非洲国家提供经验。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新秩序中一支正在上升的力量,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外贸规模 1997 年达到 3255 亿美元,其中出口 1830 亿美元,进口

1420 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 400 亿美元。

中国在非洲还有政治利益,即保持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存在,遏制台湾在非洲的活动。它已经在南非这样的重要国家获得成功,南非与人民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在非洲的存在还有助于支持中国的国内问题,比如西藏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支持了中国的政治目标和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尼罗河谷地各国的活动同埃及在该地区的传统活动有交叉。

埃及在最近十年在其非洲政策上经历了明显的复兴,最重要的成功就是加入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埃及非洲合作基金提供了 2000 名埃及专家,在卫生服务、打农用井、饮用水和防治传染病、防蝗灾项目中服务,此外还有灌溉和电力专家。由于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大多是尼罗河谷国家,所以埃及的活动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众所周知的发展服务,埃及同这些国家的合作实现了埃及在尼罗河水上的利益。

埃及在该地区政治取向的特点是保持稳定、制止内战、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因此,可以说中国对东部和南部非洲的政策目标同埃及政策的目标有一致之处。

有助于两国在非洲合作的因素还包括埃及是中国在尼罗河谷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的贸易额 1997 年达到 5.12 亿美元,而苏丹为 1.37 亿美元、肯尼亚为 1.32 亿美元、坦桑尼亚为 1.3 亿美元、埃塞俄比亚为 5600 万美元。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中国在两国贸易中是顺差,埃及对华贸易每年不超过几百万美元。这就要求中国通过接受所需的埃及产品来解决问题。

埃及和中国的非洲政策不仅停留在利益一致

之上,它们还应当在新千年和新世纪开始之际考虑非洲的利益,它们对未来的很多问题要做出回答:

——两国的合作是否达到了满意的水平并同实际可能性相称?

——非洲是否已经获得了两国应有的关注,尤其是在卫生、经济和人力资源领域开发方面?或者两国仍需更多地关注非洲?

——两国是否可以在同另外一个非洲国家一起进行三边合作方面提供很好的范例?

——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哪一个国家更适于进行这种模式的三边合作?

——合作的前景是否同两国与地区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联系在一起,比如非洲统一组织、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9 国集团和 77 国集团?

——埃及和中国如何看待国际新秩序和全球化时代?

——在新的世界中,两国如何以同第三世界人民利益一致的方式表达亚洲和非洲、埃及和中国的古老文明?

埃及和中国为了非洲的利益合作建设、反对外国霸权的前景广阔。像埃及和中国这样的非洲和亚洲核心国家,应当为完善两国关系而努力,尤其是在非洲框架内,以便实现两国的一致,这将有助于共同利益和非洲利益的实现。但是建设未来需要目标和政策的一致,这是我们对埃及和中国官员的呼吁。

(原文为阿拉伯文;翻译:吴冰冰)

(责任编辑:艾迪;责任校对:徐拓)

Sino - Egyptian Relationship under African Framework

(*Egypt*) *El Sayed Aly Ahmed Fleifel*

pp. 43 - 47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text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at the Sino - African Relationship Forum held by African Research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August. The author carried out comparison study from the viewpoint as an Arab and African towards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Egypt and China, believing that similarities exist in many aspects with both: Both are ancient civilization with profound influences and similar value concept, having been invaded by colonialism, national democratic movement, stance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hip; both are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constructing nations; both have essential differences in their political liv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The author has brought forth issues African scholars generally care about, such as, China's trade surplus against Africa, how Africa may "borrow" China's experi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policy towards Africa and its national interests, etc. The author finally brought forth seven questions at the end of this dissertation, problems which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have brought forth as well.

Unfolding New Chapter in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Su Huajie

pp. 48 - 49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dates back a long time; there has been ferocious progress i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urrently, South Africa has become China's biggest trade partner in Africa. However, from the trading scale and full amount in both countries, there is still mammoth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in Sino - South African trade. A pro-

truding feature in the South African market is active transit trad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are using South Africa as a "stepping stone" to enter other countries in southern Africa. China may also make use of this favorable condition to positively tap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rn African nations.

African Financial Market Situation and Financial Policy Trends

Li Zhibiao

pp. 50 - 55

Most currencies of African countries may not be freely exchanged into hard currency; they cannot be used for pay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ir value generally fluctuate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the issuing countries. Banks in African countries, small in scale, are normally interfered by government. There are not many types of financial services available, and their payment systems are out-dated. There is high return rate in the invest-

ment in African securities market, but the market has been extremely irregular and is full of risks. To cut down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owards banking industry to create a diversified and competitive banking system to fully put into play the function of marketing in capital setup is the major trend in the existing financial policies of African nations.

(责任编辑:艾迪; 责任校对:艾迪)